

# 博士生扩招 培养质量至关重要

□ 胡波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40多所院校陆续发布招生简章,公布博士生扩招规模,引发舆论关注。其实,早在2018年,教育部已明确提出2020年我国博士生招生总规模将达到10万人。

有人担心,博士生扩招会带来学历贬值和培养质量下降。一些高校为保证培养质量,相继出台分流淘汰机制。比如,清华大学在修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时,明确提出完善资格考试、选题报告等培养环节

节的实施细则、考核要求和分流与退出制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也发布详细的《博士研究生分流退出机制实施细则》。

严把人才出口关,建立和完善退出机制,对保障人才培养质量至关重要。不过,博士生培养是系统工程,分流和退出只是大系统中的小环节,不是人才培养的终极意义。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应该在博士生入学后的培养阶段,即课程设置、科研素养培养等重要环节上下功夫。仅以笔者所观察的一些文科专业为例,博士生培养的部分中间环节还有可改进的空间。

首先,课程体系设计需要进一步完善。文科的课程学分一般在20分左右,

课程总数在8门左右,除却3门左右的公共课程,面对不同研究方向的学生,其余课程多是入门、导学性质,考核方式只需上交一篇简单的课程论文,更具针对性的方法类课程所占比例非常低。

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训练是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必不可少的工具。笔者从身边一些博士生了解到,大家只是把博士课程看作完成学分任务,第一年的时间为凑够学分,选修不少跟自己研究方向不相关的课程,第二年就直接进入论文开题阶段,研究问题难确定,研究方法不清晰,赶鸭子上架,迷茫在所难免。

唯论文的科研评价体系,异化了博士生的学习目标和秩序。国内多数学校都以至少发表两篇C刊论文为基本要

求。在此并不是否定C刊的价值,若是直接取消发表论文的要求,这于博士生未来求职而言,并无实际益处,毕竟整个科研评价体系均以C刊为核心指标。鉴于当下C刊数量较少,不少期刊为了提高引用率,选稿偏重作者知名度和职称,博士生总体论文质量也无法与成熟的学者抗衡,而一些期刊也在缩减发表文章的数量,最终导致供求关系严重不平衡,不少人因发不了C刊而无法毕业。对博士生的评价标准是不是过于单一,有没有更加多元、有效的评价方法,需要各个学校、学科立足实际情况,认真检视,当然,多元并不意味着降低评价标准。

导师对学生的投入和学生对科研的投入之间是正相关的,有的导师尽心尽

责,定期开展学术研讨、读书报告等活动,真正起到督促和激励的作用,有的导师负责博士生数量过多,根本无暇顾及每个学生,还有导师行政事务繁忙,无法抽身,有名无实,完全靠学生自己摸索。

毋庸置疑,考核是质量监督的重要手段,但作为系统性的培养机制,任何环节设置都应该以促进学生科研能力和学术素养为根本目标。严格、有效的制度应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对博士生进行分流淘汰的同时,还需要系统、综合性考虑,完善人才培养的基础环节。毕竟,在课程设置、学术训练、导师职责、评价方式等细节方面,仍有很多优化的空间。

## 别忘了疫情冲击下的打零工群体

□ 任冠青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受到高度关注,各地都在积极做好困难群体的生活保障,加大临时救助制度。其中,不能忽视的还有疫情冲击下的打零工群体。他们很多是进城务工人员,通过临时性工作贴补家用的低收入人员,工作机会受市场变化影响较大,抵抗风险的能力也相对较低。社会有责任协助他们走出困境,共渡难关。

受疫情影响,餐饮、建筑、家政、维修等强接触性行业都遭到较大冲击,而这些正是打零工群体较集中的领域。由于他们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较为松散,很多人通过日结的方式获得劳动报酬。一旦在长时间缺少工作机会,他们的正常家庭运转就会遭遇困境,还可能产生致贫返贫的风险。

对此,可以通过村(居)委会、社区网格员等基层工作人员的全面摸底,对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家庭提供一段时间的现金补贴、基本生活物资等,完善临时救助机制。针对居无定所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可以设置临时安置点予以帮扶,解决基本生活困难。目前,多地对于生活出现困难的流动人口,也已要求不受户籍限制,由当地民政部门直接实施临时救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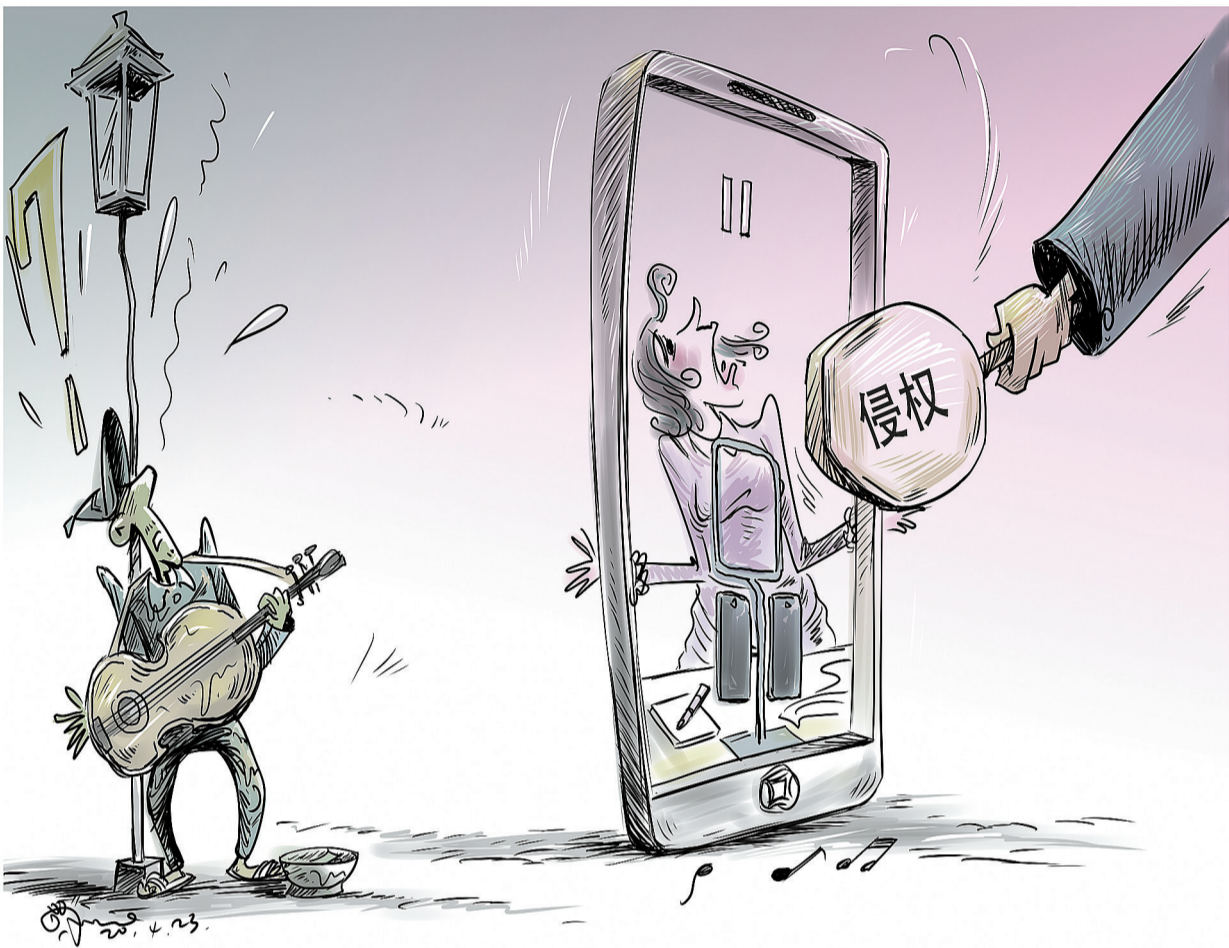
从长远来看,仍有必要在法律层面明确零工经济的劳动关系性质,使其纳入社会保障和管理的范畴。零工经济,由于劳动者流动性较强、工作关系变动较多等特点,不仅使其难以正常受益于公共福利体系,也给相关监管工作带来困难。作为对传统雇佣模式的有益补充,零工经济必然会随着互联网平台和分享经济的兴起逐渐发展。因此,有必要从法律上厘清劳动性质和主体责任,在制度上实现应保尽保。

传统找工作渠道不畅,并不意味着打零工群体就无用武之地。在市场环境的变化之下,不少企业都考虑采用灵活的用工模式,以更多元的雇佣结构提高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能力不匹配等原因,企业的用工需求与打零工者的就业需要有时难以实现有效对接。对此,政府有关部门需组织搭建信息发布平台,让供需双方都能精准、及时、全面地获取相关信息,并通过组织在线招聘会等方式拓展找工作渠道。

基于各行业的需求变动,也可以联合企业力量,组织实践性强的在线职业培训,赋能劳动者,使打零工者突破原有工作领域,获得更多就业机会。比如,相对于传统的服务行业,电商、直播等领域正在强势崛起。此时,有针对性地展开与网络平台操作、商务运营有关的技术培训,提升打零工者的线上工作能力,不仅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眼前的问题,还能推动其顺应未来发展趋势,满足产业升级的需要,获得更加光明的就业前景。

对于在城市发展遇到困难、选择返乡发展的打零工者,政府也应有引导其参加春耕备耕,参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提供创业支持的方式,充分发挥这一群体的视野和能力优势,把先进的发展思路和商业模式带回老家,因地制宜地加以应用。

疫情之下,原本流动性较强的打零工群体遇到了新的不确定性,而他们本身对于风险的抵御能力又相对较弱。临时救助和社会兜底保障能够及时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精准的培训则能打造他们多元和过硬的劳动技能,从而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



代价

4月2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明确主播未经许可可在网络直播中播放或演唱涉案音乐作品,根据主播人员的知名度、直播间在线观看人数、直播间点赞及打赏量、平台知名度等因素,比照在线播放、现场表演的基本赔偿标准,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澎湃新闻4月23日) 漫画:徐简

## 阅读产生仪式感的今天 怎么劝人读书

□ 韩浩月

今年的读书日带着一些激动与焦虑。受疫情影响,实体书店营业额下降,出版机构纷纷通过做线上活动来保持活跃度,这使得今年读书日的线上推广行为非常之多。焦虑是因为一项数据的发布,说2019年中国成年人的纸质阅读量、电子书阅读量以及阅读时长都有所下降。

阅读量下降是老生常谈,每年到读书日这天到达一个话题高峰,但在怎么提升阅读量方面却办法不多。今年春节后,很多人长达两个月不能出门,读书的机会多一些未必见得,有职业作家表示,疫情期间失语,一本书都读不下去,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读书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

看到一条新闻,有家公司在读书日到来之际向员工提出了一个要求:每位员工要在一年时间里读完50本书,未完成者降薪10%,还要写读后感。如果被发现有抄袭要降薪20%。这个新闻让人啼笑皆非,2020年已过去三分之一,剩下的时间,意味着该公司员工平均每天要读完一本书,并完成一篇带有独立思考的读后感。这个任务对

书评人来说都不轻松,让员工来完成,确实有点强扭牛头喝水的意思了。

有时候,读书的仪式感与形式感容易混淆在一起难以分辨。走形式多少对于读书的促进还是有点用的,定期买书是一种形式,出门旅行行李箱里放一本书是形式(看看另说),像学生那样硬着头皮写完读后感交给公司领导也是一种形式。形式总会对一些人有用,没准会有人受此影响,找到了读书的仪式感,从此喜欢读起书来。

以前对于走形式的读书,还是有很多批评的,现在虽然大家也不赞同,装作读书的样子,但态度已经不那么严苛了,甚至觉得,哪怕拿本书握在手里装装样子,也比一天到晚盯着手机屏幕好。有人用手机专门在地铁里拍读书的人,拍完后发到社交媒体上,很多人点赞。地铁里读书原本无关仪式还是形式,但被拍出来传播,就有了仪式感,因为这种行为,被舆论美化、提升,有了示范效果。

读书行为的发生,来自于内心冲动的驱使,这才产生读书的乐趣,也才有了“深阅读”的条件。人们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公众的读书热情,就是因为那时候进行“深阅读”的人很多。现在多是“浅阅

读”,读流行畅销书、成功学书籍、网络小说。那么多的经典著作,不被年轻人重视,这让人忧心忡忡,担心人类金子般的思想成果就此蒙尘。这样的担心,往往会外化为劝人读书的言行。

旧社会私塾中的孩子不好好读书,先生要用板子打手心,现在的互联网时代以及未来的智能时代,得哄着孩子和年轻人读书,与社交媒体、电子游戏去争抢他们的注意力。有创意的“阅读推广”,是将读书的仪式与形式、诗意与实用等无形元素融为一体。必须是掌握了多学科秘籍的高手,才做得了这项事业。值得高兴的是,中国已经有了一大批做“阅读推广”的人,在经济发达的一二线城市,参与读书活动的读者也越来越多,读书作为一种时尚,正在慢慢地回归人们的生活中。

买来一本书以后束之高阁,是一种亏欠、一种浪费,阅读欲要是有一天能战胜了占有欲,读书率不言而喻就会直线上升。当然,书该买还是得买的,站在自家书房书桌前巡视时的那种充实感,有助于刺激你的阅读欲望。在舒适的家中能读进去书,那意味着无论去哪里,随手所携带的书都能够成为你身边最重要的行李。

## 如何将沉迷网络化为乐学之力

□ 朱永新

这次停课不停学,让网络教育提前全面实现,许多学校都通过QQ、企业微信等软件进行远程授课。网络素养已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础素养,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培养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意义。将未成年人与互联网割裂开来,显然与时代发展趋势相悖,既不可取也很难实现。

很多国内外研究显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有助于学生获取知识、拓展技能、为未来步入社会做好准备。所以,有必要引导全社会认识互联网社会的时代特征,打造并推广符合未成年人人生发展和社会化需要的网络素养教育体系。

这次停课不停学的实验,暴露了我们大中小学师生网络素养的一些不足。在现有的课程体系之下,网络素养相关的教育内容

尚未被全面、合理、科学地纳入普及性义务教育的各个阶段。无论是课程内容和课时数量,还是师资队伍和教学水平都远远无法满足需要。由此,形成了两个完全脱节的世界:一边是孩子们在网络中自然生长,在缺少成年人引导的情况下建立起自己的秘密花园;另一边是一些家庭和家校网络为洪水猛兽,只关心学生的核心科目成绩,对他们在网络中的言行毫无所知。

未成年人网络知识和技能的习得,很大一部分是由同学、朋友等非正规教育渠道完成的,这导致一些青少年网络素养存在明显的短板,也由此产生过度沉迷、网络暴力等社会隐患。因此,有必要将网络素养纳入普及性义务教育基础课程,系统规划与组织,通过自主阅读、活动研讨等灵活而深入的方式,培养青少年养成健康的上网习惯。

同时,家庭应承担起未成年人网络

素养教育的责任。父母的网络素养对未成年人有言传身教的作用,与孩子的及时沟通也能避免前文所说的“脱节”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项调研发现,亲子关系越好的家庭,孩子的网络认知能力、技术能力和创造能力越强。不过,调研中的父母虽大多认同互联网对孩子有帮助,但是自己并不知道如何引导孩子。因此,网络素养教育体系应当将家庭纳入其中,首先让父母懂网,也懂得如何在网络问题上与孩子建立开放友好的沟通。

网络平台和互联网企业也应该通过科技向善,善于利用新技术为未成年人打造健康友好的网络环境,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上线产品的青少年版,建立防沉迷机制等。事实证明,互联网企业在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方面大有可为。比如,腾讯公司正在尝试建

立的未成年人健康上网保护体系,就针对网络游戏构建事前设置、事中管理和事后服务体系,有效降低未成年用户的游戏时长。与此同时,通过线上线下的不同方式,为家庭提供网络教育辅导,搭建亲子沟通的桥梁,为大中小学提供课程和师资培训。网秦公司支持的“少年派”项目在农村地区推广网络教育,让孩子们学习使用iPad,为培养农村孩子的网络素养探索了经验。

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是未成年人的特点,也是教育的源头。避免未成年人沉迷游戏,引导他们利用网络好、乐学、需要教育的智慧。建立由政府牵头,家、校、企三方联动的网络素养教育体系,不仅是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有效行动,也是为网络时代的未来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为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授、民进中央副主席)

## 别让色情暗网死灰复燃

□ 刘婷婷

最近,有网友举报称,国内有些色情网站涉及性侵犯、迷奸、偷拍等内容。近日,记者调查发现,通过检索“萝莉”“幼齿”等主题,不难找到部分网站、论坛和App,其中不乏涉及未成年人的视频,部分影像浏览量高达20余万次。在某些社交平台和App的暗网中,还有人公然叫卖色情资源,11套偷拍视频打包售价70元。在这背后,已经形成一条从拍摄到建网站,再到运营牟利的黑产业链条。(《新京报》4月22日)

对网络色情违法犯罪,我国历来予以严打。《刑法》规定了传播淫秽物品罪,两高出台过办法相关案件的司法解释,现实中,政府有关部门打击网络色情专项行动不少。但在严打之下,为何还会出现这种“野草烧不尽”的尴尬局面?从网络环境上看,互联网上的色情网站超过3.7亿个,每天约有两万张色情照片进入互联网,青少年网民极易遭受侵蚀,这些都为色情暗网提供了滋生土壤。从网络技术上看,一些不法分子将服务器架设在境外,花几十元更换域名就能躲避查处,最后“死灰复燃”。就算有了

收款码,也做不到“顺藤摸瓜”,根本就找不到网站运营人员,因为他们或使用虚假身份,或购买别人微信。从网络监管上看,目前还不能实现网络空间全覆盖、网络链条全监督,这些“真空地带”的存在,让一些不法之徒看到了发财时机,敢于冒险“火中取栗”,以致致陷非法。

彻底清除色情暗网,不仅要技术创新上发力,更须形成从立法到司法、执法的强大合力。画面色情甄别技术,如今已不是不可攻克的壁垒,一些直播平台已应用于监管领域。2019年10月21日,两高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对网络犯罪进行全链条惩治,提供了可靠司法支撑。近期,浙江省嘉兴市中院二审宣判一起挂牌督办的特大贩卖淫秽物品案。有关涉案平台为包含100余个色情直播平台的特大聚合App,4名被告人分别获刑3至13年不等。之前,中美警方联手摧毁全球最大中文淫秽色情网站联盟“阳光娱乐联盟”,被认为是合作打击网络色情行动的范例。在当前形势下,这样的行动越多越好。经过多管齐下的努力,坚持“日拱一卒、久久为功”,这场对网络色情的战争,就一定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 振兴乡村 电商大有可为

□ 刘远举

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期间,与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的村民交谈时表示,电商作为新兴业态,可以推动乡村振兴,是大有可为的。

这已经不是习总书记第一次提到电商对农业的作用。在最近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总书记也指出:要切实解决扶贫农牧产品滞销问题,组织好产销对接,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利用互联网拓宽销售渠道,多渠道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

疫情之中,物流畅通与实体市场的正常运行,受到一定影响,很多供应链道被切断了,大量的农产品上行受阻,农产品积压、滞销。这种状况,冲击了不少地区的销量,包括草莓、猕猴桃等水果。尽管价格一降再降,但销路依旧受阻。农产品不像工业品,可以有很长的库存期,很多农民欲哭无泪。

在需求这一端,城市里很多农贸市场、菜市场关门,但市民需求仍然是存在的。此消彼长之下,供需出现了失衡。电商平台很好地起到了衔接供需的作用,把农产品的供需转到网上完成,用快速送达。疫情期间避免了人群聚集,对保障供应、平抑物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以在农产品上行领域深耕多年的拼多多为例,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农村网店在拼多多上卖出的农产品订单数超过10亿笔,同比大增184%。今年前3个月,单品销量超过10万件的农(副)产品达到1030款,接近2019年全年近七成水平。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中国电商的飞速发展与创新,这一次疫情中,人们的生活水平可能会大打折扣。电商平台对于解决农产品的产销问题,对于解决城市的农产品供应问题,的确大有可为。

长态势,得益于国家相关政策的精准扶持,也与地方政府的探索和努力息息相关。

电商对农产品销售的巨大作用,也被各级、各地政府发现,并积极参与其中,进一步推进了电商的作用。早在今年2月,农业农村部就发起“农货产销对接”活动,各类直播带货纷纷出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疫情期间,抖音、快手、京东、拼多多等平台也都开通了县长、市长直播间,并给了流量支持。重庆、湖北、浙江、广西、广东、安徽等地的市长、县长纷纷走进直播间,亲自站台直播,推销当地的农产品。各种网络大V、网红、直播明星也纷纷参与进行,一起助力农产品走出乡村,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围绕电商平台进行的各种尝试,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间与市场的首创精神,并在政府的助推下得到更大的发展。回顾历史,很多变革都是如此,市场积极创新,基层以民为本,敢闯敢干,最后上升为国家政策。当年小岗村改革,也是如此,最后在神州大地上成燎原之势,推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回过头来再看,电商对农村的意义,也绝非卖货那么简单。就今日而言,电商助农,已经将根系深深地扎进了中国的土地里。

互联网平台,规模大;数字技术强、人力资源强;横跨多业态,涉及产业链长,具有生态性。这些因素使得电商平台,能够有更大的适应能力,去应对疫情带来的困难,并用这种能力去赋能农产品、农民、农业、农村。电商平台的力量,不仅是一个农产品从田野到城市的上行销售渠道,反过来,也是一个从城市到田野、传递资本、人才、知识、创新、商业模式等变革力量的下行渠道。上下打通,整个乡村就会活起来。

也正因此,电商对乡村的赋能,不仅是疫情期间的自救,用更长远的目光来看,也是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解决之道。

农产品上行在第一季度呈现爆发增